

PADMA DESAI

[英]帕德玛·德塞 主编

郑超愚 校译

牛飞亮 龙向东 沈玉华 陈放鸣 祝 峰 胡铁雯 侯 利 译

走向全球化：

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

GOING GLOBAL

•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in the World Economy •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全球化：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 / (英) 德塞主编；郑超愚校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8

(国外大视野丛书)

ISBN 7-5011-4485-0

I. 走… II. ①德… ②郑… III. ①经济发展战略…分析…世界②市场经济-研究-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187 号

Going Global: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in the World Economy

Copyright © 1997 UNU/WID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走向全球化：

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

〔英〕帕德玛·德塞 主编

郑超愚 校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875 印张 412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485-0/F·644 定价：32.00 元

前 言

在 90 年代初，联合国大学及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UNU/WIDER）主持过三项有关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研究项目，重点探讨转轨过程的内在问题。随后，UNU/WIDER 又将注意力转向外部联系方面，考察这些转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本书就是一项题为“欧洲及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变化中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以及全球性含义”的研究课题的主要成果。制定本项研究就是为了弥补在前期研究中对于外部因素对转轨过程影响关注的不足。该项目所使用的一体化概念的含义是指在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下通过各种合作方法前社会主义国家重新进入世界市场以及中国和越南进入世界市场的进程。

一个国家加入全球体系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包括该国经济本身的历史性发展，它影响着这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同时还涉及地缘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的和文化方面的重新整合过程。所有这些方面又是在地理位置、国家规模、自然禀赋、人力资源、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政治与制度模式、竞争力等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下相互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外部因素包括：影响交换参与者关系的全球性或地区性规则框架，国际贸易体制，主要国外市场的竞争格局，在使一国加入其全球生产与市场营销体系过程中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利益，以及产品、资本、服务和劳动力市场融合或者连接的程度与类型。这些因素不是一成不变，其

变化一方面反映在不断波动的市场体系上，另一方面反映在有关国家在全球市场中作为价格接受者或是价格制订者的地位转换上。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一国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全球市场也处在重大的结构性的和空间性变化过程中。

该项研究将形成两册专集。本册注重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变化所具有的国际性含义，对诸如汇率管制、外贸和资本流动政策等重要问题，就他们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所及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后续的第二集中论文将作进一步的充实。

有关国家是根据他们融入全球市场的特征而选择的，分别涉及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和越南。芬兰和印度之所以也包括在内，是因为他们与需作调整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联系。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没被选入，因为该地区政治问题尚未解决而缺乏主导趋势。

本专集分析了与中欧、东欧、后苏维埃国家、中国、越南以及印度制度和政策变迁的全球性含义相关的各种问题。UNU/WIDER 主席乔瓦尼·A. 考利亚与我本人在此向哥伦比亚大学帕德玛·德塞致谢，是她协调了该项研究的第一部分工作；同时，也向她为国家章节作出贡献的同事表示感谢。我们认为，本专集对于理解转轨过程的复杂问题以及影响转轨过程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米哈里·西梅

匈牙利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前 UNU/WIDER 主席

序

作为本论文集基础的研究项目，得到了设于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及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的资助。该项研究计划1994年春末在赫尔辛基大会上形成，于1995年夏初召开了论文研讨会。

在许多朋友和同仁的帮助下，我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雄心勃勃的庞大项目。我衷心地感谢 UNU/WIDER 前主席米哈里·西梅，他邀请我主持这一项目；感谢 UNU/WIDER 的洛伦尼·塔万宁为我组织赫尔辛基会议献计亮策；感谢 Manmohan Agarwal, Shailendra Anjaria, Josef Brada, Michael Connolly, David Dollar, K. C. Fung, Michael Gavin, Brigitte Granville, Vijay Joshi, Deena Khatkhate, Jean-Maurice Léger, Carol Leonard, Ian Little, Costas Michalopoulos, Prabhakar Narvekar, Mario Nuti, Richard Portes, Nicholas Stern, 和 Alan Winters 在数据来源、经常交流和深刻评论中所提供的宝贵建议；感谢 Engene Beaulieu 极为出色的研究协助，以及 Karen Halliburton 和 Gordon Wong 为帮助我编辑本专集浩繁的文稿所付出的努力。

本书献给印度前财政部长 Manmohan Singh，他作为一个大胆的改革家和富于经验的政策制定者，在1991年夏开创了印度迈向开放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

译者的话

由帕德玛·德塞博士主持完成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WIDER）研究项目《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继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1995年转型报告——投资与企业发展：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及其1996年更新版、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之后大型国际性转型经济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该研究项目从转型经济的个案经济史考察出发，通过独到而精致的计量分析技术进行转型经济的国际比较研究，在研究路线和研究方法上明显优于上述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研究项目。该项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代表了转型经济比较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成就，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覆盖了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东欧、前苏联和亚洲的主要经济转型国家，虽然关于国别经济的某些研究结论可能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或许片面和极端，但是其实证研究态度无疑是严肃认真的，所积累的经验资料是向后续研究开放的，为其他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该书总体上采取了新自由主义观点，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为核心的一揽子市场取向经济政策构成了描述各转型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参照系。不过，该书并没有盲目推崇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方式，而是充分重视各种

经济转型政策措施在市场导向下的相互包容和内在一致。它依据实质经济的表现评价各国经济转型的相对绩效,系统检验了各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进步和与世界经济整合程度的改革速度依存性质,客观上更为倾向渐进转型的中国改革模式。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的,而国际市场天然地是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因而强调各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所显示出的所谓与国际市场惯例接轨的历史性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正是利用国际市场(或者说国际市场参数与封闭条件下国内市场参数的不一致)优化国内资源配置的实现过程,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潜在经济剩余的经济均衡化要求。始于本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对外经济关系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适应并且促进了经济起飞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1980—1997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9.7%,相当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成功实现体制转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深化三重协同转型的中国范例,而中国范例在构成检验和修正既有经济理论的类型化事实的同时,也应该在一般性经济理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以揭示其超越具体时代和国家局限的历史前瞻性和国际普适性含义。《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对于理解中国范例的经济学意义,特别是对于在中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而从1998年起采取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措施拉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正确认识体制转轨与对外开放的相互关系,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实现中国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直接的实践指导意义。

受新华出版社委托,我们组织翻译了《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书。在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新华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张雪梅给予悉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我们在此

表示由衷的感谢。受学识和时间所限，虽经反复校核，本书翻译的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谅解。书中所有错误和遗漏，均由校译者负责。

郑超愚

1999 年 8 月



帕德玛·德塞是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哈里曼研究所的格拉迪斯和罗兰·哈里曼讲座比较经济体制教授。出版物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央计划与苏维埃经济》（MIT 出版社，1983 年）和关于苏维埃经济及其原理的学术性计量经济分析论文集《透视更新运动：苏联改革的设计和困境》（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 年），她的作品频繁出现于《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月刊》，现在正在完成《叶利钦下的俄罗斯改革》一书。



郑超愚，1967 年 11 月生，山西繁峙人。1995 年 3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 年 4 月至 1997 年 4 月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做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中心负责人。已出版《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等学术著作，在《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 余篇。

目 录

前言	(1)
序	(1)
译者的话	(1)
导 论	(1)

第一部分 中欧和东欧

1. 捷克共和国.....约瑟夫·C. 布拉达 艾利·M. 库坦(117)
2. 匈牙利 安德拉什·布拉霍 彼得·加尔(147)
3. 东德
4. 波兰 斯坦尼斯洛·威利兹(224)

第二部分 北欧经济

5.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卡莱弗·库克(259)
6. 芬兰

第三部分 后苏维埃经济

7. 俄罗斯

-
8. 哈萨克斯坦..... 海勒·弗莱斯伯克
路兹·赫夫曼 路吉·林达拉(378)
9. 乌兹别克斯坦 迈克尔·康纳利(412)

第四部分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10. 中国 理查德·S. 埃考斯(447)
11. 越南 大卫·道拉 伯杰·林格朗(469)
12. 印度 满芒汗·阿戈旺(503)

导 论

帕德玛·德塞 (Padma Desai)

本专集的论文分析欧洲、前苏联 (FSU) 和亚洲若干转轨经济国家进入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的一体化持续过程。作者在论及有关国家的论文中讨论了各国关于贸易和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政策, 同时评价了所研究的国家在贸易结构多样化、向硬通货市场的定位以及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FDI) 等方面的进展, 分析的时间跨度为 1990—1995 年。

作者考虑了宏观经济稳定与价格自由化对外贸外汇体制管理的影响。同时, 私有化也在其有助于削减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支持 (从而减轻财政负担)、刺激对外贸易 (如通过拆解国营贸易组织) 和吸引对私有化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范围内予以讨论。

然而, 在转轨经济各国对外开放的初期, 要评价经济转轨的相对绩效, 必须采用适当的标准。我将在本章开发这些标准, 从而能够对各国的一体化表现作出比较和排序, 并且探讨转轨争论中的关键问题, 即在哪些国家进行更为快速的经济改革是否有利于他们更快地进入到世界经济。^①

对该问题的回答涉及评价改革速度以及选择衡量可能与速度相关的改革成果指标体系的分析性问题。例如, GDP 增长率是否应该成为衡量改革战略成功的唯一指标; 是否应该包含失业率上涨指标。后者对于正在致力于稳定宏观经济的决策者来说是严峻

的挑战。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评价转轨经济的全球化，那么我们应寻求什么样的外部状况指标呢？而改革在整体上是否成功与其全球化的成败与否是如何联系的呢？

在寻找这些相关问题的答案时，我依靠的是各位作者对所选择国家决策者采用的转轨战略的深邃分析。详实的记录（在附录中的更新和扩充截止到1996年上半年）帮助我探讨和开发了评价转轨进程成功与失败的有意义基准，并且根据这些基准对有关国家进行排序，最后对产生于改革速度与排序成绩间关系的分析性问题予以强调。

基于这样的小样本，我的结论只是尝试性的，然而仍然是有趣的。如下界定的改革速度，显然与GDP增长率、至研究期末已经自由化的外汇外贸制度以及积极的全球化成果如国外直接投资量的增加（通过考察期末的固定资产总投资贡献度来测量）显著相关，而且也与同期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相关，尽管在“休克疗法”模式中这种相关性不是很显著。

从全球化的整体效果来看，快速改革似乎是理想的。但是该结论必然被如下事实所淡化，即快速改革似乎与失业率负相关，以致我们将面临着一方面在增长与全球化、另一方面在增长与失业方面的短期置换。实际上，这种短期置换可能意味着快速改革不可能是政治上可持续的：尽管从长期来看，快速的生长能创造更多就业，但是在短期内选民们可能并不愿意忍受失业的增加。那么，改革者出于政治生存的考虑，可能会选择更为缓慢的改革战略。他们也许决定，短期内产业的缓慢复苏和扩张通过维持转轨进程在以后带来较高的增长，而急转弯却会导致难以承受的失业（或者收入不公和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破坏政治稳定。^②

国家选择的标准

对本专集中研究国家的选取作如下说明。有资格入选的国家必须是过去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现在正经历市场化转轨。因此，本专集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此后简称东德）以及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北欧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后苏维埃国家；以及亚洲的中国和越南。与以往侧重于欧洲或者后苏维埃转轨经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方法不同，这里采用了更加丰富的样本，包含了亚洲的改革经济。^③

芬兰，作为形成本专集研究项目的东道国，包括在样本内，因为它构成了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外缘。后者以不同的方式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产生本专集加以研究的不同后果。由于与前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方式贸易安排突然中断，这一转轨对某些国家，尤其是芬兰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着严重的冲击。芬兰为此不得不应付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所产生的纠纷，相应的调整在本书第六章进行了详细研究。不过，芬兰显然是不适宜包括在本章考察的大量国家截面转轨经验内的，因而在下述分析中排除在外。^④

另一方面，尽管印度并非正统的中央计划经济（CPE），却包括在内。印度经济以许多产业部门的公有制为特征，而且存在一个对私人投资、生产、贸易决策施加指导性控制的 Kafkaesque 网络。印度卢比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也不可兑换。实际上，印度经济带有许多社会主义转轨经济已经在力图摆脱的制度特征。和这些国家一样，印度于 90 年初启动了它艰巨的改革。

这些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加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各国的决策者都致力于在市场价格和私有财产的制度下控制通货膨胀，实施对外贸易安排的自由化，统一和稳定汇率并且加以管理，以维持其贸易竞争力和有效地吸引国外投资者。

作者在论及有关国家时对全球化各种目标间的相互作用、为实现这些目标在总的改革努力背景下采取的政策以及在各个国家取得的特殊约束和优势，都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些国家的政策被详细地总结在附录的表格中，供参考用。

出于分析的需要，我首先将所选择的国家根据改革的性质和速度，进行功能性分组，以便最终将其专门与全球化成果联系起来。

定义“高速”、“中速”、 “低速”改革者

有关国家区分为高速、中速、低速改革者三个类别。速度反映了若干方面。起步早是因素之一，改革的实际成效是另一因素，再者就是改革的综合性程度。最后一项在实践中或许是最重要的：通常包括价格控制、反通货膨胀的财政货币紧缩、通货的统一和（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贸易自由化和实施私有化等项目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针对这些不同方面的可能组合，根据从（本专集已作分析的）各国经验中概括的相应特征，我选择将这些国家分成以下三组，从而使得比较分析更具有意义。

首先，将那些选择了一揽子全面改革方案并且首先予以介绍

而后贯彻实施的国家界定为高速改革者是合理的。然而，有时在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高速类别较为困难，如果改革方案中不同项目的进展速度差别极大。例如，越南在放开价格、统一货币、保持稳定等方面进展迅速而且富有成效、但在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方面却严重滞后。应该将其包括在高速类别吗？考虑到它实施迅速而果断的改革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我相信应该如此。这就相当于对观察到的即使包含了更多因素也同样不可避免的改革进程进行准确判断。^⑤

第二，中速改革者通常被称为渐进者，他们启动改革方案常常是及时的，但是对实施其中关键因素一般都较为迟缓。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学术界关于俄罗斯改革分为像J. 萨克斯那样的“休克疗法者”和像我这样的“渐进主义者”的争论是围绕改革速度的一个关键维度：稳定能够承担的速度是什么。1992年初，Y·盖达尔总理宣布并尝试推行休克疗法，准备立即大幅度削减俄罗斯预算赤字，从据估计1991年占GDP17%—21%的高位水平降至1992年一季度末零水平。他失败了，因为正如渐进主义者担心的那样，最高苏维埃（议会）拒绝了这样一个过激的方案。^⑥休克疗法者的观点，即以渐进方式攻击高通货膨胀，根本不起作用，并且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混乱之所以破灭并不只是因为像我在德塞（1994a，1994b，1994c，1995a，1995b）那样的学术分析，而是因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控的帮助下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政府从1994到1996年宏观经济纪律逐步而坚定的应用的确显著降低了通货膨胀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⑦

因此，当转轨经济面对的政治约束给定时，先易后难地实施改革方案的关键成分不失为明智之举，尽管这将会使该国落入“中速”或渐进主义者类别。因休克疗法而使稳定化迅速逆转的俄罗斯改革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证。放慢经济稳定的速度，与此同时向前推进私有化、统一汇率、放开价格控制等其他可行的改

革项目，应该被认为是合理而“有效的”。

然而这些论证理由并不适用于“渐进主义”。这一思潮表现出的简直就是理智的混乱、官僚的僵化或者意识形态的暧昧，与早期转轨经济中那些“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插曲有着明显的认同。在那些事例中，只是将市场机制有限地点缀其中，而没有抓住市场机制的真谛。因此，由于试图将共产主义转变为某种最终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旧模式更为友好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这样的内在不一致性，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有限的改革受到损害。^⑥

第三种“低速”改革者类别本来应该是那些拥抱“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然而这种方式早已被普遍怀疑，唯其如此才是正确之举。这些正在转轨的国家在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一方式会有任何意义的幻想。因此，“低速”改革者在这里是指那些在1990—1995年后仍然推延其改革的启动，并且绝大部分领域也行动迟缓的国家。

下面将随即指定本专集中国家在三个类型中的归属，对类别选择的理由将作简要说明。

指定各国的类型归属

波兰显然属于高速改革者。1990年1月它的转轨方案有一个理想的计划：大力削减预算赤字以对付通货膨胀；放开几乎所有的价格；统一兹罗提，贬值，尔后与美元挂钩；取消贸易限制；取消或大力削减关税。捷克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越南都采取了类似的一揽子转轨方案。速度也是东德从社会主义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本质：东德和西德在1990年7月1日实现了经济、货币和社会的完全统一，这也意味着排除了东德在经济上自我重建的